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

Studies on the Genr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Fictions

侯运华 刘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

Studies on the Genr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Fictions

侯运华 刘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侯运华,刘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203-0696-6

I. ①中… II. ①侯…②刘…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6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意谓卑琐无价值的言谈，非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里的“小说”方指篇幅短、旨趣微、传播广的叙事文体。小说流派的出现，是在小说类型形成的南北朝、唐宋之后，志怪小说、传奇、话本等类型的小说创作渐趋活跃，经明代拟话本创作的繁荣，至明清始出现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小说流派。但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流派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流派’语出何良骏《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陆、潘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桢，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百一》，盖显然明著者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流派’主要指诗歌流派，又称‘诗派’”。^①“文学流派”则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活动范围内，对文学与现实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志趣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合。”^②可见，“流派”有自觉倡导和后人追认两种类型。严家炎论述现代小说流派时，从时代政治因素、国际文艺思潮、哲学思想、作家作品带动、文艺刊物五个方面阐释其成因，认为“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而且由于它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因此，这种文学现象也更令人注目。”^③本书所用“小说流派”的内涵，则是指受近代社会思潮、外来小说流派影响，并受作家修养、区域文化、同人刊物诸要素制约形成的创作群体。

近代小说流派多指于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思想内蕴、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相同或相近的小说家自觉形成的小说流派，其存在多依托近代印刷技

① 王先儒、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② 《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9页。

③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术、传媒发达而形成集群发展的特征。正是群体呼吁的冲动,使近代作家既传承“士好议论”的特质,亦改变古代小说家基于道德个人劝诫的创作习惯,转而形成对时政的集体吁求,发出谴责之声,以期警世、启蒙。这是谴责小说流派的主要价值。既然明白政府不可期待,官场一片黑暗,何处寻找社会良心?何人保障社会公平?小说家在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中寻找载体,于是寄托百姓愿望的清官、豪侠成为承载理想的符号,在清官微服私访、屡破奇案的阅读中,在侠客行侠仗义、笑傲江湖的潇洒里,获得想象性满足。社会情感有了寄托,个人幽怀何以抒发呢?千古文人所艳羡之“红袖添香夜读书”“小红低唱我吹箫”的美妙境界,在世俗生活中难以寻觅,便到妓院、梨园追寻,从名妓、名优处获得精神满足,从而建构起名士的休闲生活。无缘或不屑到欢场休闲的民初青年,欣然拥抱来自西方的自由恋爱思潮,在学堂里痛饮爱情美酒,回到家庭则遇父母阻挠,于是哀怨之情萦绕胸怀,形诸笔端便是哀情小说。随着社会发展,家庭阻力已不能阻止其爱情时,作家们便将其情感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酝酿出社会言情小说,成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

无论谴责之声多么高亢、清官侠客多么尽力,无论名士名妓的休闲如何自得、民初青年的悲剧如何难以避免,归根究底都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怎样改革社会呢?近代作家们选择向外、向内两个维度寻求启蒙的资源。向外者,发现侦探小说蕴含的法制思想和科学精神,塑造的体魄健全、智力发达的侦探形象等,是中国社会改革亟需的文化内蕴;而其善恶有报、正义必胜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亦极为契合。于是,由翻译到创作,侦探小说逐渐兴起。与这种从形式到内容整体借鉴的流派不同,科学小说、翻新小说则以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演绎近代文化理念。向内寻求资源的主要是历史小说流派,无论是聚焦刚刚过去的历史重大事件,还是描绘历史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抑或是选择古代历史以影射中国现实等,均凸显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警醒世人、反思现实的创作目的。

理性思考近代小说的创作情况,就不会为其众声喧哗所眩晕,也不会为其缺乏大师而遗憾。处于社会边缘的作家们以各自的文本反映出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将其做整体观则可以概括出近代社会的风貌,进而体悟到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当我们研读一个个文本时,可以从中领略到作家的个体意识、文化选择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进而勾勒出中国小说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发展轨迹。

应该看到近代小说流派众多,各有特征之处,这就制约着研究者不可

能选择同一标准对其进行阐释。如陈平原所说：“类型研究绝非仅是分类贴标签，为每部作品寻到其所属的‘家族’。在某种意义上，分类的结果并不十分重要，要紧的是分类的‘过程’——在将某一部作品置于某一类型背景下进行考察时，你可能对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更充分的体验和了解。”^①因此，我们的研究策略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设计章节，可以是几个相近的流派一起论述，如第二、第三、第五章均如此；也可以是一个流派一章展开。若发现了两个流派间可比较的问题较多，即展开比较研究，如第四章第四节；若发现散点透视后有集中论述的必要，则在最后一节展开论述——对侠的存在状态和历史小说的流派特征即如此。与此相对应，论述时域的确定也以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合理性为准，而不受制于历史时段的限制。如旧派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高潮均为20世纪20—40年代，其代表作家、作品是30—40年代出现的。若囿于历史分期，则无法呈现其全貌，故将其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对小说流派溯源时，我们也尽可能将其发展轨迹勾勒清楚，论述时域兼及古代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的存在已逾百年，现当代小说受其影响，不仅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小说流派的类型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学界尚未有完整论述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出现，对于出现众多流派和诸多小说家的近代小说而言，是很不公平的现象。笔者积聚多年所得，一一呈现在此，希望得到方家指正；也是抛砖引玉，期待能够看到更加精到的论著出现。

① 陈平原：《类型等级与武侠小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绪 论

小说之勃兴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史实。时人曾饱含激情地感慨：“咄！20 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砢砢；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①可见，小说在 20 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之大。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经先觉者如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倡导、充分接受与糅合中外小说优秀传统、众多作家的积极参与而逐渐形成，呈现出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本书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文本且学界有定论的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这些小说流派有谴责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翻新小说、历史小说等，其存在早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部分学者通过点评、序跋等方式对其进行评论。最初的评点、序跋等多是对单个文本的评价，虽成为流派研究的基础，但还不是真正的流派研究。至 20 世纪 20—30 年代，胡适、鲁迅、陈子展、阿英等人的论著关注到其中影响较大的小说流派，于各自文章里尝试进行小说类型建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曾论及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但侧重小说评介，流派特征的概括缺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从文学内部、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述了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的成因，并阐释其历史渊源、文学地位。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则重点论述了谴责小说、政治小

^① 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1907 年第 10 期。

2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

说和言情小说的特征。1937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出版,一方面多角度论述小说繁荣的原因,另一方面从题材角度阐释谴责、狭邪、言情、翻新、革命诸流派。此期研究存在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特征概括不尽确切等不足。

20世纪40—70年代,受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影响,对近代小说流派的研究聚焦于谴责小说等少数流派。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1959)强调其价值在于“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强调其表现手法具有过渡性,并批判了狭邪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稿》(1973)更具代表性,该书分别“批判”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剖析谴责小说和革命小说。此期,小说流派研究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导致其学术内涵大减。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进入繁荣期。台湾学者林瑞明的专著《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1980),从作者生活与成书过程、作者对国事的态度、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等方面切入,并结合史实对谴责小说进行了扎实的研究。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1981)以独特视角研究鸳鸯蝴蝶派小说,对国内学者正确认识该派产生很大影响。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以史为背景,专章论述了公案侠义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小说、历史小说、革命小说等小说流派,侧重内蕴阐释;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则对其“形式特征的演变”进行剖析,论及谴责小说、新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小说流派。关爱和的《悲壮的沉落》(1992)以文学思潮的嬗变考察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等流派;袁进的《鸳鸯蝴蝶派》(1994)论述研究对象源流时,论及狭邪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流派。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997)剖析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内蕴,提出了新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及狎邪小说、科幻小说、公案小说等流派。欧阳健则重写《晚清文学史》(1997),以作家为主,论及新小说等流派。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1997)论述鸳鸯蝴蝶派的成因、特征与代表作家,并论及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流派;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1999)分别论述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四大流派。

进入21世纪,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将近代小说分为社会言情、武侠党会、历史演义等

几大板块论述；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2000）从传媒、读者等角度解析近代小说，令人耳目一新；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2000）试图从小说演变的视角勾勒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001）侧重考察近代小说流派的历时性特征；裴效维、牛仰山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2001）总结了20世纪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研究成果。谢庆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2002）阐释了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独特价值；栾梅健的《纯与俗的变奏》（2006）论述谴责小说、狭邪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的优长与不足；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2007）以期刊研究为基础，论及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小说流派；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2010）论及狭邪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流派。此外，一些专著对于特定小说流派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台湾学者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2004）、余小杰的《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2004）、侯运华的《晚清狭邪小说新论》（2005）、苗怀朋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刘铁群的《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2008）、朱志荣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2009）、付建舟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2011）、蔡之国的《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2012）、胡安定的《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2013）等。不少未刊博士论文也以近代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如朱国昌的《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2008），范正群的《清代侠义公案叙述研究》（2009），李世新的《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2002）等；吴泽泉的《暧昧的现代性追求》（2007）研究翻新小说、王卫英的《重塑民族想象的翅膀》（2006）研究科学小说、刘春水的《沉重与恣意的书写：谴责、暴露及其他》（2007）研究谴责小说等也各有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小说流派研究，一方面呈现视角多元化，大文学理念的引入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没有整体研究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已有的关涉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也存在个案研究多、综合研究少，或侧重社会内涵、忽视本体特征与流派效应等不足。惟其如此，说明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存在着继续拓展的空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性。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谴责之声:晚清谴责小说	(1)
第一节 近代小说的繁荣及其成因	(1)
第二节 晚清谴责小说发展轨迹与代表作品	(10)
第三节 晚清谴责小说的独特内蕴	(19)
第四节 晚清谴责小说的叙事特征	(28)
 第二章 庙堂江湖:从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到武侠小说	(37)
第一节 “侠”的文化内蕴及在文学中的演变	(37)
第二节 近代公案小说	(41)
第三节 近代侠义小说	(54)
第四节 旧派武侠小说	(71)
第五节 侠客的存在状态	(88)
 第三章 情天恨海:从狭邪小说到鸳鸯蝴蝶派小说	(98)
第一节 中国言情小说的渊源	(98)
第二节 晚清狭邪小说	(101)
第三节 民初倡门小说	(119)
第四节 鸳鸯蝴蝶派小说	(124)
第五节 哀情小说的独特内蕴与叙事模式	(140)
第六节 社会言情小说的情感内蕴与叙事特征	(145)
 第四章 兼容中外:中国侦探小说	(170)
第一节 中国侦探小说兴起的原因	(170)

2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

第二节	早期中国侦探小说的特征	(174)
第三节	中国侦探小说的风貌	(179)
第四节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比较研究	(191)
第五章	抨击憧憬:近代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	(196)
第一节	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概述	(196)
第二节	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的独特内蕴	(201)
第三节	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208)
第四节	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212)
第五节	科学小说与翻新小说中民族国家想象的成因	(224)
第六章	演义史实:近代历史小说	(230)
第一节	晚清历史小说	(231)
第二节	民初历史小说	(246)
第三节	历史小说诸问题辨析	(256)
结语		(261)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69)

第一章 谴责之声：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中国近代最早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小说流派。虽说此前也有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创办《新小说》刊物、创作政治小说等，但其影响尚无法与谴责小说相比。谴责小说的兴起与近代小说的繁荣关系密切，因此，欲论述谴责小说的成因及其特征，就需要阐释近代小说繁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谴责小说的发展脉络、代表文本、独特内蕴、叙事特征等，方可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客观透视，进行价值评估。

第一节 近代小说的繁荣及其成因

中国小说发展到晚清时进入繁荣期。从创作数量看，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比中国古代小说的总量还多。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创作小说 7466 种，翻译小说 2545 种，合计 10011 种。2002 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又有增加。也就是说，近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至少也在万种以上。另据欧阳健《晚清小说史》里依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共出版小说 133 部，平均每年 2.2 部，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年间，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 529 部，平均每年 48 部。其中，1900 年出版 3 部，与过去平均数相同；1901 年出版 9 部，1903 年出版 39 部，形成第一个高峰。1907—1909 年出版 104 部，是 1900 年的 34 倍。^① 这些统计，一方面，证明了近代小说确实呈现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从中也能看出正是 1902 年倡导“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创作量激增，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密

^①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 页。

切关系。近代小说之所以在此期走向繁荣,是因为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传媒和读者背景。

一 社会思潮与政治环境

从社会思潮剖析之,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巨大的变故,曾经辉煌的古老帝国一步步走向衰落,国民对于清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①梦醒后乃是失望之至,顿生谴责之意。诚如鲁迅所言:“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②而作为清政府统治体系的直接载体,官场的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活跃其中的官员们,多为捐纳得位。于是,官员一改昔日治世良才的形象,庸才充塞官场,腐败、贪婪成风,自然容易成为谴责对象。同时,社会动荡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力,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使文人不再畏惧文字狱,敢大胆创作揭露时弊和官场黑暗的小说。上海租界的存在,更是为小说家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里,小说家不必忌讳自己的作品是否与传统道德冲突,即便是宣传革命的作品,也不会马上带来祸害。包天笑当初欲印谭嗣同的禁书《仁学》,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哪)家的名号就是了。”^③足见列强入侵、租界存在状态下,传统士人不惧清政府权威到何种程度。因此,此期小说在题材上呈现出以往难有的多向性,对社会思潮的反映,也处于同步状态。

从政治视角考察,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小说创作的繁荣均与政治家的倡导有关。康有为、梁启超在发现了小说具有超越六经的传播功能之后,便有利用小说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意图。1897年,康有为认为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④对小说便于传播思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6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④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想、易于接受的特征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受其影响，1902年，梁启超著文抬高小说的地位：“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①“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海盗海淫诸作可比。”^②严复、夏曾佑认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同时，“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③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四十一册《蒙学报演义报合序》里声称：“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因此，他倡导“小说界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认为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的革新，都有赖于小说的革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些倡导，虽说将社会功利放在首位，与传统的“教化”文学观有相通之处，却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将小说当作社会改良运动的工具，希望以小说刺激麻木的国民，实现救国理想。此后，梁启超利用其影响力，译介日本的政治小说，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以实际行动引领着小说与政治结缘；并带动一批将小说当作改良社会工具的政治家和小说家投身创作，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二 文化冲突与外来影响

从文化视角研究之，可以发现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为小说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对此问题的阐释可从创作主体、外来思潮、小说翻译三个层面展开。近代小说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突围出来的文人，他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其优长与不足皆有透彻了解，为其用小说表现具有传统文化内蕴的题材奠定了基础。冲出旧的藩篱后，无论是像梁启超那样置身东洋，直接感悟西方文化，还是如刘鹗那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抑或是李伯元、吴趼人等离开故乡，在上海租界异域氛围里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内涵，均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于是，其文化构成便不再如古代作家那么单纯，在意识深处往往存在文化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页。

② 《〈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③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

的冲突与整合。他们创作的小说，便具有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内蕴，不管是如《文明小史》里对外来文明的引进与抗拒，还是像《孽海花》里表现的多重文化冲突，无不扩大了中国小说的表现领域，有助于小说创作的繁荣。

外来思潮的存在多方面促进了近代小说的繁荣。首先是使近代小说出现了新的时代风貌，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无论是哀情小说里描写新式学校的交往礼仪，还是写学校开运动会，抑或是谴责小说里对西餐、西装、皮篷马车、轮船、火车等代表西方科技发展物品的描述，均比传统小说动辄神魔鬼怪、皇权争夺之类贴近读者，而且是读者渴望了解的对象；对读者有吸引力就意味着有市场，能够拉动小说创作的繁荣。其次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立体化。近代小说不再停留在对形象外在元素的描写上，而是抓住社会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困惑描写其自主意识，使人物形象凭内在魅力吸引住读者。从《玉梨魂》《冤孽镜》等哀情小说对青年人生存中进退失据、充满失落迷惘心态的揭示，以及他们爱而不能得其所爱的痛苦心理，到倡门小说里妓女喊出“我们到底是一个人呀”这样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皆体现出传统小说中不可能出现的内涵，呼应着年轻读者对以人为本意识的追求。再次，从语言层面看，大量西方语言的引入和外来词的介入，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超前意识，无疑也推动着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促进着近代小说的繁荣。语言承载着时代变化的信息，如果我们不仅仅视其为工具，而是透过语言体悟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读者的审美趋好的话，应该承认，此现象反映出近代文学趋新趋洋的语言走向。

近代中国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始于1872年5月《申报》开始连载的《谈瀛小录》和《一睡七十年》。虽然1840年广学会就翻译了《意拾喻言》（今译《伊索寓言》），实际上，这是寓言，而非小说。《谈瀛小录》则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有关小人国的内容；《一睡七十年》是美国作家欧文的作品。它们属于纯正的翻译小说。1872年11月，中国最早的文艺刊物《瀛寰琐记》创刊，并从第3卷开始连载英国小说《昕夕闲谈》。1885年，《万国公报》连载《回头看纪略》。1887年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的译本《百年一觉》。1896年，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刊载了翻译侦探小说；1898年，他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发表他翻译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1899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随着鲁迅、周作人、苏曼殊、周桂笙、陈冷血、包天笑等高水平翻译家的出现，西方文学名著开始大量翻译进来。从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统计的数据看，翻译小说

占此期出版小说的近三分之一，是很可观的文学成就。这些翻译小说的出版，从四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小说的繁荣：第一，翻译小说蕴含的文化理念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提升了近代小说的内蕴。由于翻译小说大多是欧洲和美国、日本的作品，因此，其承载的西方价值观、情爱观、婚姻观等，对翻译者和阅读者而言均有熏染，待这些翻译家从事创作，或读者受其翻译小说影响动笔写作时，其小说中传达的往往是相对进步的理念。第二，翻译小说成为近代作家创作的范本。中国侦探小说受益于西方侦探小说是最直观的现象，近代短篇小说所受翻译西方小说的影响更大。无论是截取横断面反映生活本质的结构方法，还是捕捉一种感受创作出抒情小说的思路，均能够从西方小说里找到渊源。第三，翻译小说输入了西方小说的创作技术。从侦探小说整体结构上的倒装叙事，到人物心理细腻刻画，对近代作家都有直接的影响。林纾翻译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后就概括其倒叙手法曰：“上文言杀人者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惶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①可见，倒叙手法已经被近代作家所认知且在创作小说时尝试运用，如吴趼人《九命奇冤》对《毒蛇圈》的借鉴等。刻画人物心理的技巧，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手中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从叙事人称方面看，西方小说擅长运用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已经被近代作家掌握，在吴趼人、徐枕亚、李定夷等人的小说里，都有这种叙述手法的成功运用。第四，对近代文学评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梁启超等人对小说地位与价值的评判，与他们对西方小说的价值“误读”有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评论中国经典小说，建构起具有独特价值的小说悲剧理论。鲁迅早期文艺观的形成和《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创作，显然与其翻译《域外小说集》有难以分割的关系。这些大师们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反过来激发年轻作家们的创作，也有助于近代小说的繁荣。

三 传媒发达与作家自立

近代小说的繁荣还得力于传媒发达与作家自立。近代传媒的发展建立在引进西方印刷技术的基础之上，同治、光绪年间，西方先进的机器印刷技术和设备传入中国，并很快推广开来，为大规模印刷、出版小说创造了条件，也为报刊业的发达奠定了物质基础。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

^① 林纾：《歇洛克奇案·序》，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